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三七期 ——  
(二〇〇五年六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06b)

---

【史海钩沉】《毛主席语录》出版揭秘	韦梅雅
【文革秘闻】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王 锐
【珍贵史实】轰动海外的《刘主席语录》	高 放
【文革探讨】《江青文选》的来龙去脉	史爱国
【历史一页】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 (上)	舒 云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 《毛主席语录》出版揭秘

• 韦梅雅 •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发行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它的发行速度之迅猛，发行量之大，近乎一夜之间攀居世界之首。据报载，仅“文化大革命”几年之内，国内就出版了3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以亿计算。以“毛主席语录”为主体，在中国大地掀起的浩瀚的红色海洋呼啸澎湃。大街小巷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必须悬挂大红色的“毛主席语录”牌。

军队是红海洋的源头，《毛主席语录》的发源地，因此，对毛主席表示虔诚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的形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军队领导着时代新潮流。“《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天天读，雷打不动”，“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均是在全国“大学解放军”的热潮中从军队向地方推而广之的。

《毛主席语录》最早诞生于解放军报社，为弄清这一重大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笔者拜访

了解放军报社的退休编辑田晓光女士。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一上任就提出：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顶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

1960年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林彪提议，会议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并提出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决议》中，林彪还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个《决议》，从内容到结构都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初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戏称他的这种做法是“复古”。

毛泽东对这个决议非常满意，据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现出极大的喜悦。”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并批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毛泽东的指示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中央批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为此后若干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最具时代特点的系统的纲领性文件。

20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

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军报党委按照林彪的指示，于1961年5月1日起开始在《解放军报》报眼（在报头右侧位置）上刊登毛主席语录。

田晓光当时在《解放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卡片资料工作，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自然就落到了她的头上。她在每天下午社里的编前会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心，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此项工作后来又几经易手，总编室和各部的同志都曾参与过）。

当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在很短的时间内选择出应时的毛主席语录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军报领导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也感到压力很大。天天选登，有时难以为继。但此事是林彪交办的，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不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为此，当时任报社总编

辑的李逸民专门去请示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罗荣桓明确答复说：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尽管罗荣桓的指示使报社压力稍有减轻，但报社做具体工作的不敢有丝毫懈怠。

解放军报社副总编唐平铸带领人马到新闻界典型单位去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泽东选集》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做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对于《解放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有借鉴意义了！唐平铸指示军报资料室马上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资料室派了4个人抄了一个星期。卡片抄回来后，由田晓光负责整理。她按军队工作需要设专题重新排列，并把军报以前积累的卡片也充实进去，最后又作了校订。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才比较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也是以这套目录为基础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受到了部队的广泛欢迎。当时军队里人员的文化素质不是很高，让战士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著有很大困难，而军报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精辟、最通俗地道出真理的语句，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

林彪对他提出的毛主席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总政已经印发了一本毛主席著作选读本，《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要求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供全军指战员学习的呼声很高。林彪看过《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稿后，批示：“很好，可以印。”

1961年5月1日《解放军报》按照林彪的指示天天刊登毛主席语录以后，部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也变得简捷了。后来，林彪又提出了很著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30字学习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该方针在部队被广泛运用，选择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解决部队官兵活的思想，便成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捷径中的捷径。从那时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异军突起，调动了全军基层官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

在全军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典型单位和个人，当时最具有典型推动意义的当属某部指导员廖初江。

自从《解放军报》天天刊登毛主席语录起，时任班长的廖初江就带领全班开始用“毛主席语录小黑板”的形式学习毛主席语录。在他的带动下，连里各班和连部、伙房、食堂的墙壁上，都挂着一块写着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战士们说：“这是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方法。”

战士们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他们平时挂在墙上学，行军背在身上学，生产竖在地头学，射击摆在靶场学。

战士们说：“小黑板，抬头见，毛主席教导在眼前；天天学，天天用，行动有指南，步步走

向前。”

战士们称赞这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有三快：学得快、用得快、见效快。

他们有时还把各班的毛主席语录小黑板集中起来开晚会，由各班讲他们带着什么问题选学什么语录。学习报纸重要新闻时，也结合学毛主席语录，他们把这叫做“语录配新闻”，使大家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毛主席的指示也理解得更深了。

廖初江所在连学习毛主席语录，每班有几个骨干，他们在学习中都积累了一套常用的毛主席语录，可以及时针对问题选读。每次进行政治教育运动，或布置工作任务，连队事先集训骨干，教给他们利用什么时机、遇到什么问题，应该组织全班学习什么语录。各班为了使问题找得准，语录选得准，常常是班里同志一起找班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确定选什么语录，集体学习，订出行动措施。过些时候，大家再议一议学习心得，看一看自己的行动，做到学一条用一条，学会一条再学一条。

在廖初江经验的启发下，部队有的单位将毛主席语录做成语录笺学习。有的部队指战员还将报纸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剪贴下来，分门别类，自制成语录本。《解放军报》和军内的一些小报开始大量连篇累牍地报道用这些方法学习的经验。

那个时期，《解放军报》不断地接到部队干部战士的来信，希望军报能把刊登过的毛主席语录汇编成册，下发部队。这些信件通联处都转到了田晓光的手里。鉴于这种情况，田晓光拿着部队的来信，向主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编唐平铸建议，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她认为当时编辑《毛主席语录》的时机还是成熟的。首先，毛主席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在1958年时，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集纳毛主席20年间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有关论述，冠以《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称发表，当时毛主席曾用批示、改写按语的方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他说，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时间相距20年之久，又采取集纳的形式，但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第二，当时，《解放军报》在工作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辑录大型毛泽东专题语录的经验。比如，1961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田晓光他们集中整理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理论联系实际》的专题语录汇编。1962年2月3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第三，《解放军报》资料室已建立起了一套较完整、较实用的毛主席语录专题卡片，对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提供了较完整的材料。第四，这件事会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因为这是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

唐平铸听了田晓光的意见后，先是开玩笑地说：“你们胆子不小啊！敢提出给毛主席编书。”后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好建议，但事关重大，我们报社定不了，要向上面请示以后再说。”

1963年12月2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全军上下政治工作方面的要人。解放军报社副总编唐平铸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要求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供全军指战员学习的呼声很高。当时，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正好刚从参加中印自卫还击战的部队回来，也提出了为部队编一本《语录》的想法。姜思毅在会上说，在中印自卫还击战中，指挥员在战场上用毛主席语录鼓舞战士士气，效果非常好。姜思毅与唐平铸议论这事后，当即请示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萧华认为是个好建议，但是有些问题比较为难：一是不知道毛主席本人的态度。二是以往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整理工作都是由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持搞的，我们军队编《毛主席语录》会不会受到指责？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会不会有偏差？三是如果能编，谁出面组织编？搞不搞班子？……诸多难题中最重

要的是此事涉及毛泽东本人，毛泽东肯定还是否定？关系甚大，因此很难马上拍板。罗瑞卿、萧华和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领导同志反复权衡后，认为还是让解放军报社编好，解放军报社是总政直属单位，《语录》的编者可署名“总政治部”。

唐平铸从会议上打电话给田晓光，要她具体办理此事。他说，总政指示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要快，要在会议期间发到每位代表手里征求意见。他让田晓光先拟个提纲，他回报社再定。

为了保证如期完成任务，报社又调来一位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陈士忠参加这项工作。时间紧迫，必须争分夺秒。

田晓光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先拟定了编选计划。她当时对《语录》专题的设置是这样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涉及的领域广泛，要选一些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全军官兵个人思想革命化有较强针对性的语录，依此设类，共设立了20多个专题。编选计划先送唐平铸审查，后经唐平铸修改，社党委研究通过后，一班人马上投入了编选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采取选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出一个专题，校对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仍觉得速度慢。最后索性搬到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除夕之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诞生了。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也可以说是《毛主席语录》的雏形）出版了，选编毛主席语录200多条，因此书名定为《毛主席语录二百条》。16开本，白色封皮，红色书名，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实际收语录268条，分设23个专题。

《毛主席语录二百条》按期发到了与会代表手里。经过讨论，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田晓光等人对《毛主席语录二百条》进行了增补。5天以后，新的《语录》问世，书名为《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白皮红字，落款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语录》“前言”略有改动，下署日期为“1964年1月10日”。

这本《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二百条》的基础上，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增设了2个专题，共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此版《毛主席语录》除了发给与会代表外，还少量地下发部队征求意见。因当年印制数量少，现在社会上也很难找到。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另外还包括一些先进单位征求意见。就这样，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语录》（雏形）就诞生了。

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部队广大干部、战士一致要求将内容再充实一些，并尽快发到部队基层。

报社编辑人员又开始了第二次对《毛主席语录》的增补工作。经过上上下下的反复论证、修改，最后定稿所设专题扩大到30个，类目顺序和类名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前言”与1964年1月10日的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稿）“前言”的内容基本相同，但落款改为“总政治部1964年5月1日”。

这本《毛主席语录》编好后，报社送军委、总政领导审查。林彪批示：“很好，可以印。”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1本，战士每班1本，《解放

军报》还为此发了消息。

在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前，报社编辑部人员建议请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题词最好写：“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田晓光将这四句话通过军报秘书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田晓光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她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田晓光拿着题词感到为难，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在“听”字旁边还多写了一点。《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对这个“听”字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请工人做了技术处理。

这本1964年5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正式出版的第一版《毛主席语录》。

根据部队意见，这本《毛主席语录》改为52开本（分简装和精装两种，简装为白色纸面封皮，精装为红色塑料封皮）。这是最早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可以揣在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

《毛主席语录》下发部队以后，成了军队广大干部、战士的启蒙教材。

1964年7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发行，其中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为使《毛主席语录》中有这一部分内容，并弥补过去编排上和所选内容上的不足，解放军报社提出了《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意见。正在这时，康生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分别打来电话，提出《毛主席语录》中有3条语录虽是毛主席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这个意见得到上级批准。

在再版《毛主席语录》选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内容增减问题。

田晓光等人认为，从各个专题的设立看，大的方面都有了，就是充实专题中的内容，重新审视一下内容是否正确、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对原有的30个专题，没有做大的改动。变动比较大的是增加了3个专题。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妇女”专题和“党委领导”专题。这样，再版的《毛主席语录》就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的毛主席语录也由335条增到433条。

为了使再版的《毛主席语录》编选条目更加完整地反映毛泽东思想，更加切合部队需要，唐平铸指示田晓光等人下部队征求意见。

田晓光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对《毛主席语录》前言的改写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他说，《毛主席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去。

从部队回来后，田晓光专门将孔祥秀对前言的意见向上作了汇报。唐平铸亲自重新改写了前言，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这段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

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

在军报领导讨论研究《毛主席语录》再版本修订问题的会上，罗瑞卿对“前言”中引用的林彪的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表示不同意，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时，采纳了罗瑞卿的意见，从“前言”中删去了这句话。

1965年5月，总政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讨论审定《毛主席语录》再版本。

唐平铸由三座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田晓光马上赶到会场。当田晓光走进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在等待了。唐平铸就对田晓光说：“快来快来！你来介绍一下选编《毛主席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田晓光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思绪，把这几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也交到了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置一致通过。这33个专题除了3个新增设的外，个别的专题名称作了调整。经会议讨论，语录仅删去了6条，定为427条，共8800字。

这本再版本《毛主席语录》就这样如此顺利地通过了。经军委和总政领导审查批准后，于1965年8月1日正式出版。编印单位和“前言”署名仍为“总政治部”，发行范围仍为部队“内部发行”。根据林彪的指示，发放范围由原来干部每人1本，战士每班1本，扩大到全军上下人手一册。为了方便携带，又由52开本缩为64开本，全部装上红塑料皮封面。

《毛主席语录》从编辑到出版，受到了罗瑞卿、萧华、刘志坚等军队许多高级领导的关怀，他们一遍一遍地审，一遍一遍地改。报社领导也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尤其是主管《毛主席语录》编选、出版工作的解放军报社当时的副总编唐平铸，从拟定专题开始，到一次一次的修改审查，以至前言的修改，“再版前言”的撰写，一直到《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在《毛主席语录》编选、出版过程中，他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面沟通军委总部领导，下面具体组织实施。他曾为《毛主席语录》的修改、出版，多次到林彪家中当面请示汇报。林彪“很好，可以印”的指示就是他向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转达的。这些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毛主席语录》的编选、出版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甚至是创造性地工作。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军报又陆续收到广大读者提出的各种意见，意见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述上。意见大都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军报根据读者意见，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建议修改前言。同时他们又向领导提出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发活页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军报的报告，并认为他们的建议可行。

这次前言仍由唐平铸亲自动笔修改。

前言修改完毕，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突然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家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田晓光将它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1本太少，大家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1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一位战士。”从那时起，全军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各地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向解放军报社要《毛主席语录》，有的单位还派人来联系购买，后来有的大单位干脆要求解放军报社代印。

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毛主席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只送了军委、三总部领导同志各一本样书审阅，未送中央其他领导。最先是朱德，5月5日，书正式出版第5天，他就派秘书到军报来要。朱德索取《毛主席语录》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当时军报发行科科长是夏云成，副科长是高寄语。朱德的秘书来到发行科，是高寄语接待的，高请这位秘书代向朱老总求一幅字。没几天，朱德就让秘书送来了一幅“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条幅赠与高寄语。夏云成知道这件事以后，托高再为他向朱老总求一幅字，朱老总又为夏云成题了一幅“独有英雄驱虎豹”的条幅。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彭真等也都先后来要。

对于领导同志要《毛主席语录》好办，而一些地方单位、个人来要就使军报无法招架了。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解放军报》领导请示主管军报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

5月9日，刘志坚来电话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的情况和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

然而，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毛主席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打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毛主席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工作任务繁重，军报专门成立了《毛主席语录》发行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但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原计划发行420万册,结果猛增到1300多万册。当时承印《毛主席语录》有11个印刷厂,工人们白天黑夜没命地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分批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报社领导请示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批示: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同时提出,地方要军报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让军报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叫他们自行印刷发行。

1966年3月1日,文化部党委向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提出《关于〈毛主席语录〉印制发行工作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同意,《毛主席语录》开始向全国公开发行。

《毛主席语录》决定向全国发行以后,各地印制《毛主席语录》原由解放军报社供应纸型,后来所需纸型突然增多,解放军报社制型设备不足,建议由文化部安排解决,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文化部同意,确定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制型供应全国各出版部门。为此,文化部于1966年4月14日,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出版)局(厅)发出《供应〈毛主席语录〉纸型的通知》,明确指出:“确定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制型供应,你们如需要补充纸型,需要几副,请速直接与该社安排制型供应。”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也包括《毛主席语录》。从此,印制《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按各自地区人口的数量为标准印制,达到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到底印发了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数字。

据1969年1月2日新华社发的消息,全国已有300多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仅1966年到1968年11月就出版发行了7.4亿多册(不包括军队和地方单位自己印的)。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毛主席语录》越出越多,从16开本到128开本以及缩印袖珍本和学生使用的课本,还有以《毛主席语录》为主的三合一、四合一,以至到六合一版本。除汉文版外,有蒙、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还有盲文版,一下子覆盖了全国。

《毛主席语录》走向全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还引起了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风潮,全国各地都编,各种版本在社会上流传不少,但是都没有总政这本《毛主席语录》发放的这么广泛。

1966年,《毛主席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毛主席语录》出口一事。

10月,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到军报联系《毛主席语录》出口事宜,他们说,中

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总政这本《毛主席语录》了。

11月8日，他们再次与军报联系，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毛主席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副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30000册。希望军报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又向文化部、宣传部打报告，希望尽快赶印《毛主席语录》出口本。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毛主席语录》已有国际书店向我所订货10万册，香港订货8万册，我所已于1个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制出口本20万册的计划……《语录》出口问题长此拖延下去，势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起初不能落实出口的主要原因是“前言”和“内部读物”问题，后来，“内部读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再印时去掉字样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发表后，这“前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据当年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的郭选先生提供的资料，仅北京外文局翻译出版的外文《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到1972年就用37种文字，印了1008万多册。有英、法、德、西班牙、日、意、缅甸、阿拉伯、斯瓦希里、俄、老挝、阿尔巴尼亚、越南、泰国、孟加拉、印地、葡萄牙、世界语、泰米尔、印度尼西亚、豪萨、乌尔都、波斯、罗马尼亚、挪威、塞尔维亚、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尼泊尔、朝鲜（平壤语）、蒙古（新蒙文）、希腊、土耳其、菲律宾、普什图等文版。其中英文版从1966年到1972年再版7次，共印了200多万册。这37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曾在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几乎遍及全世界。1976年9月13日到21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27届国际书展上，展出了用37种文字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对外发行直到1979年2月才停止。

不少国家未等我国翻译的该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老挝、马来西亚、北加里曼丹、刚果（布）、西班牙、芬兰、朝鲜等国家，用英、法、日、西班牙、阿拉伯、希腊、僧伽罗、泰米尔、冰岛、荷兰、挪威、丹麦、瑞典、意大利、弗拉米、阿姆哈拉、马拉雅拉姆、乌尔都、老挝、印地、旁遮普、芬兰、朝鲜、孟加拉等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中法国，早在1966年1月，《前言》还署名“总政治部”的时候，就在巴黎翻译、出版、发行了法文版《毛主席语录》。日本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3月，也是在《毛主席语录》内部发行时期，就翻译出版了4种日文版《毛主席语录》近30万册。瑞典从1967年到1969年，《毛主席语录》共印了6版。

□ 《党史博览》2004.7

~~~~~

## 【文革秘闻】

###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 王 锐 •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

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如当年的《江青文选》一样，早在“文革”高潮期的1967年至1969年间，即已有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编印发行过《陈伯达讲话集》、《伯达文选》之类。笔者收藏至今的一册《伯达文选》，由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于1969年7月编印，大16开本，篇幅颇巨，达488页，约有3斤重量，估计有100万字以上。共收录陈伯达从1933年秋至1969年4月，三十多年间的著述、文章、讲话共100余篇。其中已出单行本的诸如《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名篇，部分编目仅有篇名而无正文。依笔者所见，这大概是辑录陈伯达著述最完整的一个《文选》版本。

也许正因为编者系四川大学这样有学术文化含量的单位，又是以“革委会政工组”这种官方正式机构出头，不比“文革”普通的只知冲冲杀杀以批判揪斗为能事的群众造反组织，这册《伯达文选》不仅内容较厚实，选编态度上也比较严谨慎重，而且印刷也很美观（封面设计及扉页印刷均不错，另有三幅大照片），在当时“文革”的印刷出版物中，恐怕算是佼佼者了。为显示这种审慎严谨，编者煞费苦心地在正文前，专门附有一页《说明》，全文如下：

为了帮助我校的广大的师生、教员、工人、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我们选编了《伯达文选》，作为内部学习参考资料。

为了力求资料尽量完善，《伯达文选》所收的文章，讲话等，虽然基本上是解放后公开发表过的，但也有少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和解放前发表过的，而且我们无法一一加以订正，这是特别加以说明的。因此，本书只作内部学习参考资料，不得外传。凡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一律不得扩散、引证。“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有关规定。若有违犯，要严加追究。

编者一九六九年七月

从这个说《说明》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出是将陈伯达视为类似江青那样的“文化革命旗手”、党内路线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按照当时流行说法，叫“毛主席司令部”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种至高无上地位来看待陈伯达的。从一定程度上说，连周恩来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能享受这种“尊荣”。当时无任何机构组织出头编印《周恩来文选》便是证明。因此才有说明中要帮助人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些非常高屋建瓴又相当针对现实的话。

从内容方面讲，这册《伯达文选》，所有文章、著述、讲话按时间顺序通排，大致可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从1933年到1949年止。第二部分为建国后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第三部分为“文革”时期。陈伯达一生著述的“精华”，几乎都在建国前的那部分里。甘惜分先生文章所说的“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几十篇”，大约其多数包括在其中。

《伯达文选》开篇文章，为陈伯达写于1933年的《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平心而论，这是陈氏较有学术水准的文稿之一，同类者还有《文选》中的《从名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扬子哲学思想》、《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等）

最后一篇是1969年4月底或5月初（原稿无具体日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稿。此《文选》编于1969年7月，算是包括陈伯达的最新讲话文稿的一个文集。以陈伯达“一贯紧跟”的政治形象，当时身居高位的显赫，编纂者这也算是“跟得紧”的一种表现了。尤引人注目的是《文选》卷首有三页篇幅占上整版的大幅照片。第一幅是毛泽东与林彪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第二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4位最高领导身穿军装满面笑容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的合影照，世称“四巨头”照。在当年（陈伯达倒台前）极为流行和有名。此照片的说明文字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最后一幅照片是陈氏在天安门城楼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发表讲话。照片上，陈伯达处于突出位置，他左边是毛泽东及林彪，毛泽东正呈拍手状，为陈伯达的讲话鼓掌喝彩。照片的说明文字也别有深意：“陈伯达同志向文化革命大军说：毛主席时时刻刻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他的心，永远向着群众。”显然，这幅照片更是突出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显要作用，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的路线紧跟，以及受毛泽东高度信任的政治姿态。

其实，照片中所展示给世人的，在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册《伯达文选》的“文革”部分中，收有一份题为《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短文。其实，那是陈伯达的一份大字报原稿，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紧跟毛泽东将攻击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一次政治表态，当时就很引人注目。

在1966年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运动的攻击点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此举极令与会者震惊与困惑。而身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则是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紧跟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于毛泽东大字报的第二天，写下这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大字报。在这份大字报中，陈伯达如毛泽东在大字报中一样，没有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但是却露骨地攻击刘邓是“镇压群众”，“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还从所谓的理论高度，对毛泽东大字报的观点予以阐释，并试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方面，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寻找依据。

无论当时还是事过之后来审视，陈伯达这种“亮相”都是很出彩的。由此，他也获得了相当的报偿。几天之后中央领导机构出人意料地作出大幅改组，此前，仅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名列刘少奇、邓小平、朱德、李富春等老资格领导人之前，成了中央第5号人物（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本来陈伯达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4位，因江青嫌陈伯达文人出身，怕其压不住刘、邓等人，就将本来名列末位的陶铸提到陈伯达之前的第4位，以镇住刘、邓等。不过，几个月后陶铸因故被罢，陈伯达名正言顺成了中国政坛第4号人物）。两个月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与会者（也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主打讲话”（这册《伯达文选》中亦全文收入该讲话）。这个讲话被称为“文革”的“经典讲话”之一。这个《讲话》中，陈伯达“创造性地”使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提法”，将所谓“刘邓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文革”开始了一个新的进程。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讲话》深为赞赏，并于几天后不仅亲笔批示：“该稿看过，很好。”而且还进一步批示说：“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一本。”毛泽东将陈伯达这篇讲话大量发行到全国每个党支部，甚至红卫兵小队，可见对其赞赏好评到什么程度。反之也可证实，此时陈伯达其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册《伯达文选》编印之时，尽管表面上陈伯达仍然以中央“第4号人物”的身份在“无限风光”，其实私下里，他因为与江青的矛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已经失势，被

排挤到了次要位置。这也是陈伯达下决心改换门庭投靠林彪集团的主要理由。只是当时此事仍为“高层机密”，一般人无从知道罢了。也因此才有《伯达文选》的问世。一年后陈伯达在庐山翻船，这册《伯达文选》不仅成了“禁书”、“毒草”，被收缴，被焚毁，而且编印者均受到严厉无情的政治审查，有些人还因此而身入图圉大吞苦果。这又是当年试图对陈伯达这个“文革红人”讨好拍马，跟风吹捧的造反先生们始料不及的。如今，这册难得的《伯达文选》不仅成了较为珍贵的“文革藏品”，也成了当年“文革”进程的一份历史见证，可供史家学者们研究之用。

□ 《炎黄春秋》2004. 10

~~~~~  
【珍贵史实】

轰动海外的《刘主席语录》

• 高 放 •

◇ 寻觅绝版稀世珍本《刘主席语录》的缘由

在中国大陆进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高举并且诵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同时用以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模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辑录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不过其内容并非都是当时中国大陆所批判的刘少奇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谬论”，还有不少是与毛泽东的观点有所不同的马列主义观点。仅凭这两本语录，就不难看出：中共党内的确存在两条不同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不过其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政治权力和行政手段来决定，而是要由广大群众在全面知情的条件下来分辨，还要通过历史实践来检验。因此这本《刘主席语录》的出版，在海外不能不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轰动海外，以至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掀起大波新浪。只是中国大陆当时在完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对此毫无所知。即便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由于此书早已绝版，也从未听到有人说起，在书刊中也没有见到有人论及。

那么这一本《刘主席语录》究竟是哪一行家选编的呢？他为什么要选编这本书呢？他如何选编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如何在香港出版，然后又传播到东西方多国去的呢？它最后如何成为绝版稀世的珍本呢？我是如何得知并且寻觅到这个历史文化善本的呢？我想许多读者一定对这些问题饶有兴趣，渴望了解。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听我的知心好友、中共党史权威胡华教授说：香港有个司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书。直到2000年4月至8月我访美期间，才有机会三次拜访定居在纽约市法拉盛区铁森纳街的这位海外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他对我畅谈了平生曲折的传奇经历和学术研究成果。1919年，司马璐生于江苏泰州，幼年时失去父母，自称“五四孤儿”。后由一位马姓人家收养，只读过两年私塾、三年小学，随后行乞、拣破烂、当学徒、当报馆练习生和图书馆管理员。他历经磨难，刻苦自学，发奋读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取名马义。1937年6月加入中共，年底到延安，曾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离中共，后加入过中国民主同盟，又自建过中国人民党。1949年底，只身从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决定转向学术研究，从旧书堆中悉心搜购到很多难得的资料，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他想以汉朝秉笔直书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榜样，又追念他年轻时的恋人璐，便改名为司马璐。他在香港自办了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

等专著。他知道我是长期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工作，中共党史也在我关注范围之内时，就把他编纂的全套书赠送给我。但他又十分惋惜而遗憾地说，唯独有一本国际影响很大的书，现在手边一无所有，无影无踪，那就是《刘主席语录》。我对这本闻所未闻的小红书特感兴趣，于是就细问究竟。他说，“文革”初期读过传到香港的《毛主席语录》后，据他的长期研究，认为毛、刘二人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全对，刘未必全错，所以就设想并且动手选编两本书，即《刘少奇选集》和《刘主席语录》，并于1967年6月在香港先后出版，大受海外华人社会欢迎。他完全没有料到，《刘主席语录》远比《刘少奇选集》更为畅销，面市后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排队抢购，只好一再重印，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有的还答应送给旅日的飞机票。英文版印数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传广告最多，《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刊都登有此书信息。

这本越来越畅销、越来越火爆的小红书曾经轰动了东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建国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政治排位一直是“毛、刘、周（恩来）、朱（德）”，可是从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的排位从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当时，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刘主席语录》的出版满足了海外众多人士的政治好奇心。人们从这两本语录的对照中来分析、思考、判断中国大陆两条路线的斗争。司马璐还给我看当时香港报刊上登载的中外报刊对《刘主席语录》的评价。例如香港《明报》1967年8月16日发表的司马长风的文章这样说：“一个朋友送来一本本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我觉得很好玩，就把‘毛语录’从书架上取下来，把两本语录比较了一番。”“越看越觉得，（刘）这个人有些可取之处。拿这本《刘主席语录》来说，其中有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刘的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的书评这样说：毛、刘“这两个并肩奋斗不下40年的同志到底为什么发生冲突，目前的真相又为何，外界确实难明。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小的《刘主席语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书中所载，“有一大部分在中共反刘的论文中曾经引用过。所以是一本刘少奇的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

在香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还与在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共同在日本引起轰动。当时，日本共产党内部分为支持毛泽东的“毛派”和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15万册；而《刘主席语录》的出版为日共“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好几家日本出版社都争相向编印者购买版权。本书英文版、法文版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此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谈到本书在海外热销的情况时，司马璐还颇为坦率而且幽默地对我说：“不瞒你说，靠这本小书，我赚了一大笔钱，译为外文按国际惯例都给版权费。这样，我在香港才能买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还到世界多国旅游。当时中国大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稿费，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然的话，我还应该送给王光美女士一笔原始版权费。”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7月18日，江青一伙擅自决定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且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1968年11月1日，中国大陆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次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标志着中共党内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决胜负，已有定论。从此，《刘主席语录》这本小书不仅越来越没有销路，而且被香港造反派在一个夏日的晚上11点半钟，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全部烧毁。当时香港报刊曾以“火烧《刘语录》”为题予以报道，并有很多读者来电慰问。既已悉数化为灰烬，因此，司马璐先生于1983年11月从香港转移到纽约定居时，一本也没有带去。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找到这本绝版稀世的红宝书呢？我在美国期间，先后托友人从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查询，都没有得到。2000年底我回国后，又托香港友人从香港各大学图书馆检索，依然毫无踪影。我想起1988年和1993年我两次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期间，曾经在铜锣湾一带逛过香港的旧书店，从那里可以买到难得的旧书，如果缺货还可以预约登记。此书当初是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可能还有人收藏。于是，我就拜托香港友人不惜高价收购，终于在2003年春天如愿以偿，真是喜出望外。小书购到后，我请友人千万不要邮寄，以免丢失，可留待在港工作、我过去的学生方便时亲自带回。看到原书才弄清了：扉页上印有“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的字样，并没有署编者的姓名；底页印有自联出版社在“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74号”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印有“河洛印刷厂印刷”，1967年6月初版，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 ◇ 对照两本语录，比较两个版本异同

现在把《毛主席语录》与《刘主席语录》这两本红宝书对照比较看很有意思。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两本书都是小型本、红色塑料皮，书名都用烫金字，书前面都各有毛、刘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内容都是分编为33个专题。所不同的是《刘主席语录》系64开本，《毛主席语录》原先也是64开本，然而从1967年7月第五版起，为便于群众随身携带缩小为100开本。《刘主席语录》前面还有一张“刘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编者这样安排，我想意在表明毛、刘曾经是最亲密的战友，刘依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目录之前刊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1959年5月11日所刊资料；书后附有自编的刘少奇生平事略。看来这是为了便于海外读者了解刘的革命生涯。两书更重要的区别是《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刘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的则是“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毛主席语录》在“文革”期间出版的版本上都印有“最高指示”四个烫金大字，《刘主席语录》在第一页上也印有“最高指示”，可是其内容并非毛泽东的言论，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四十条、四十一条、四十二条、四十五条，其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产生、职权、地位和行使职权的期限。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果说我们国家有什么最高指示的话，理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法律，那是全国各个政党、团体和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并贯彻执行，而不应该把任何领导人的言论作为最高指示。《刘主席语录》不仅在书前列出五条宪法规定作为最高指示，而且在书后附录中收入我国1954年宪法全文，显然旨在强调中国按理要依法治国，成为法治国家。应该说，编者当时这种立意和用心是值得赞许的。

再细看这两本语录的目录，我们不妨先把各自33个标题并排对应开列如下：

#### 《毛主席语录》目录

- 一、共产党.....
-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
- 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五、战争与和平.....
- 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 八、人民战争.....
- 九、人民军队.....
- 十、党委领导.....
- 十一、群众路线.....

十二、政治工作·····	
十三、官兵关系·····	
十四、军民关系·····	
十五、三大民主·····	
十六、教育和训练·····	
十七、为人民服务·····	
十八、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十九、革命英雄主义·····	
二十、勤俭建国·····	
二十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二十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十三、调查研究·····	
二十四、纠正错误思想·····	
二十五、团结·····	
二十六、纪律·····	
二十七、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十八、共产党员·····	
二十九、干部·····	
三十、青年·····	
三十一、妇女·····	
三十二、文化艺术·····	
三十三、学习·····	

#### 《刘主席语录》目录

一、党的建设·····	
二、无原则的斗争·····	
三、教条主义·····	
四、宗派主义·····	
五、官僚主义·····	
六、个人主义·····	
七、个人崇拜·····	
八、党内民主·····	
九、党员修养·····	
十、个体与集体·····	
十一、人民民主宪法·····	
十二、从实际出发·····	
十三、统一战线·····	
十四、劳动创造历史·····	
十五、土地改革·····	
十六、中国工业化·····	
十七、走群众路线·····	
十八、向群众学习·····	
十九、人民军队·····	
二十、人民内部矛盾·····	
二十一、知识分子·····	
二十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十三、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二十四、和平共处·····	
二十五、和平改造·····	
二十六、和平过渡·····	
二十七、全民党·····	
二十八、全民国家·····	
二十九、全民经济·····	
三十、自由化经济·····	
三十一、物质刺激·····	
三十二、真假马列主义·····	
三十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	

对比以上目录标题，可以看出这两本语录各自所要突出的重点有同有异。相同或近似者，如共产党的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军队、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等；相异者，前书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等，后书有（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注：这三个标题原文均无“反对”二字，我认为均应加上“反对”二字才符合所选内容原意）、和平共处、和平改造、和平过渡、真假马列主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等。后书有的标题并不符合刘少奇的思想，例如“全民党”、“全民国家”、“自由化经济”，我认为这些提法并未能准确概括其所选录的刘少奇言论的内容。

进而阅读这两本语录所选的内容，就会发现其中也是有同有异。相同或近似者，如两本书都讲要重视共产党的建设，党内要有民主，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然而其所选重点确实是大有迥异的。前书十分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革命英雄主义等，后书则侧重讲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

#### ◇ 刘少奇的确有与毛泽东不同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新见解

《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编辑部选编，初版于1964年5月1日。随后又五次修订，出过六个版本，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所选所编不免越来越具有片面性；《刘主席语录》所选显然更加切实、更加深刻。由于当时没有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所以《刘主席语录》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毛主席语录》1965年8月1日第二版有270页，收入语录427段，共8.8万字。《刘主席语录》才有110页，收入语录仅190段，共3.4万字。两相比较不大相称，《刘主席语录》过于单薄。但是《刘主席语录》所选不乏精粹、精辟言论。例如，《刘主席语录》第7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版）

《刘主席语录》第26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

《刘主席语录》第27页上有一大段话讲得更为透彻：“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

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6月）

笔者认为，用以上三段刘少奇语录不是完全可以认清“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彻底破坏了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吗？

刘少奇的确有与毛泽东不同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新见解。例如《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引了如下两段话：“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8日）“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1966年7月29日，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1日）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之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有人公开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只能阐述己见，耐心说服别人，最后争取到多数代表支持。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后，允许反对派在大会上作相反意见的副报告。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即便是错话，理应不能作为定罪根据，否则就会造成党内人人自危，人云亦云，谁还敢直抒己见呢？

《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语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类似的话，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这本来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即便是伟大的人物。可是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文革”岁月，刘少奇上述这句话却成为他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领袖的罪证。这不禁令我想起“文革”期间流传很广的一本题为《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的“大批判”材料。其中把毛、刘二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不同情况讲的意见相反的两句话对照排列在一起。当时我读后就感到，如果也用这种方法编语录，岂不是可以编出一本“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吗？每个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观点都是多方面的、不断发生变化的。究竟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来选编他们的语录，看来这是一件难以做得十分圆满的事。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这两本语录都当作当时政治、文化的历史产物来看待，各有是非，各有千秋，各自起了不同的历史作用。在中国大陆刮起“左”的旋风的时刻，我们还应该珍惜海外有的中共党史学者头脑较为冷静地选编了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中共领导人的语录书，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留下了另类遗产。如果今天我们要来选编毛泽东语录和刘少奇语录，肯定都会编得比当时更加全面、更加贴切。

□ 《党史博览》2005. 3  
~~~~~

【文革探讨】

《江青文选》的来龙去脉

• 史爱国 •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首诗，深刻揭露了江青要实现个人野心的狰狞面目。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一伙的政治势力在党内一度占据上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在党中央内部处于十分重要地位，江青在党内的地位也飞跃式上升，这使江青的个人野心极度膨胀。

“中央文革”由取代中央书记处进而取代中央政治局江青也因此而成为掌握重权的“中央首长”

1967年初，中国大地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是当年1月陶铸被打倒。这直接造成的结果是中央书记处陷入瘫痪状态，由“中央文革”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

另一件事是所谓“二月逆流”受到批判。由此，中央政治局也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中央文革”继取代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之后，又进一步取得了代行中央政治局权力的地位。

这两件事非同小可。它表明：第一、在中央内部，主张大搞“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占了上风；第二、“中央文革”的权力大增。中央下达文件，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共同署名。“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成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第三、江青的权力大增。她虽名列“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但组长陈伯达不管事，真正掌握“中央文革”权力的，是江青，“中央文革”的成员也大都是江青的亲信。

从此，江青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大不同于从前了。她也是“中央首长”了。不仅仅是“中央首长”，而且是在“中央文革”中手握重权的“首长”。

这年1月，“中央文革”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下达文件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中央文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组织大权并且能左右省一级领导班子和省级大员的进退了。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

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196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

◇ 在“忠于中央文革”的流行口号声中炮制出《江青文选》的多种版本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也具备颇有敏锐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到处发表讲话，呼风唤雨。她要打倒谁，就打倒谁。现在，以她为实际领导的“中央文革”又掌握了任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大权，实际上就是左右了全国的政局。那些靠造反起家、又有政治野心的造反派头目和“红卫兵”头目们见风使舵，纷纷向江青讨好。他们先是给江青戴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桂冠，接着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讲话，编印进《中央首长讲话集》中，以“学习文件”的名义，印发江青的讲话。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刷发行。其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们看到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已经闭幕，刘少奇被打倒似乎已成定局，“文革路线”已经确立。各地造反派组织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已经掌握了中央的权力，“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地位急剧上升，于是，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酝酿、编辑、印刷、发行了共《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共收入了江青的8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26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2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27日）。

八篇讲话中，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之外，十分突出的，是把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青接见安徽、河南、湖北来京代表和参加学习班（实际上是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的代表的讲话，加以正式出版。

《江青文选》就是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为基础而炮制出来的。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的出版，给全国各地造反派一个信号。之后，各地的造反派紧锣密鼓，开始着手准备出版《江青文选》，并且在造反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掀起了一个学习江青讲话的“高潮”。在此“高潮”中，有些大的造反派组织在翻印《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时，加进了他们尽其所能地收集到的不少江青的讲话，然后冠以《江青文选》的书名，在全国的造反派组

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发行。当时，全国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印发的《江青文选》中，收入的江青讲话，种类不同、排列次序不同，而且各类讲话中，有些话语，在文字上互有出入，但整篇讲话的基本内容则大体相同。

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率先印发《江青文选》，出于一个基本的政治目的，就是为自己的造反行动甚至打、砸、抢的行动找到理论根据和权威支持。他们极力要出版《江青文选》，拉这张大旗，包住自己的行为。同时，也以下促上，用各地造反派组织印发《江青文选》的行动，压中央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只要江青在党内的地位更稳固、更高，他们的靠山也就更硬。江青也想利用各地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的这一心态和行动，尽快出版《江青文选》，打牢自己的政治基础，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如《江青文选》一样，在“文革”高潮期间的1967年至1969年间，即已有红卫兵及造反组织，还编印发行过《陈伯达讲话集》和《伯达文选》之类。如，由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于1969年7月编印的一册《伯达文选》，大16开本，篇幅颇巨，达48基本原8页，约有3斤重量，估计有100万字以上。共收录陈伯达从1933年秋至1969年4月，三十多年间的著述、文章、讲话共100余篇。其中已出单行本的诸如《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名篇，部分编目仅有篇名而无正文。这大概是收辑陈伯达著述最完整的一个《文选》版本。也许正因为编者系四川大学这样有学术文化含量的单位，又是以“革委会政工组”这种官方正式机构出头，不比“文革”普通的只知冲冲杀杀以批判揪斗为能事的群众造反组织，这册《伯达文选》不仅内容较厚实，选编态度上也比较严谨慎重，而且印刷也很美观，封面设计及扉页印刷均不错，另有三幅大照片，在当时“文革”的印刷出版物中，恐怕算是佼佼者了。为显示这种审慎严谨，编者煞费苦心地正文前，专门附有一页《说明》。

◇ 《江青文选》只不过是“野文选”最终没能登上国家出版社的大雅之堂

尽管《江青文选》有多种版本，但它只不过是“野文选”，最终只限于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流传而没有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如下：第一、1969年4月，中共中央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之后，“中央文革”不再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中央的实际工作由中央政治局负责，江青本人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并且名列第六。尽管“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当中，但毛泽东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乱政治局面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二、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除了出版过《毛泽东选集》之外，其他任何领导人的选集或者文集，都没有出版过。江青如若抢在其他领导人之前出版《江青文选》，无论怎么说，也是太扎眼了。江青也颇有政治头脑，她也要自敛一下，不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第三、中共“九大”之前，各地的造反派头目在权力分配中矛盾激化，武斗事件不断，每个造反派组织在攻击对方当中，除了用毛主席语录、林彪指示作武器外，还以江青讲话作武器。江青的话，实际上成了引发造反派组织冲突的导火线。而毛泽东则认为，在无产阶级组织内部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他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九大”之前，大联合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九大”以后，毛泽东更加坚持这一方针。在此情况下，出版《江青文选》，是不合时宜的，对江青本人也不利。

中共“九大”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这些特定因素，使《江青文选》终于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此前印发全国的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仍在全国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流传，流毒蔓延全国。其收入的江青文章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关于“革命样板戏”的多次讲话；二是在“文革”中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综合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共计67篇。其中，有讲话、谈话、指示、意见等各种内容。

虽然，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未正式出版，却暴露出江青的个人野心，成为昙花一现和貽笑大方的时代政治产物。

□ 《党史文苑》2005. 5

~~~~~

## 【历史一页】

### 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上）

• 舒 云 •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是讨论修改宪法，二是讨论新的五年计划，三是讨论战备问题。前两项议题中央都有文件，中央委员们报到后，就人手一份新宪法的修改报告和五年计划草稿。到这时，“文革”进行了4年多，毛泽东几次下决心结束“文革”都没能如愿。新宪法的制定表明我们党想跳出“文革”的圈子，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转向经济建设。但是会议召开两三天后转了向，变成了解决陈伯达的问题。在批陈之前，还批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到最后，也没讨论既定的议题。

庐山会议编组是按大区混编的，分成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6个组。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然后就是林彪突然发表讲话。8月24日，各组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后讨论，在讨论新宪法时又引出了议程之外的“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作为召集人主持了华北组的会议。据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后来回忆，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了北京军区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外，他和郑维山、尤太忠等都出席了。被分配在华北组参加讨论的陈伯达到场时，一位老同志正在发言，被主持人打断，请陈伯达先讲。陈也不客气，张口就说。他的福建话很多人听不懂，但陈先瑞听懂了，所以记得。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陈伯达还重复吴法宪的话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陈伯达边比划边说：“有人不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在这次激烈的发言中，陈伯达还讲了一通“天才”论。接着，参加华北组讨论的汪东兴也说，宪法要设国家主席这一章，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汪东兴表示拥护林彪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宪法修改报告时，热烈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如果说陈伯达在华北组的煽动性发言还让人半信半疑，而在毛泽东身边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这么一说，华北组马上一边倒了。大家都激动起来，一些人纷纷表示，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赞成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表示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华北组除召集人李雪峰外，北京的吴德、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作为所在省、市的领队出任副组长，北京军区的郑维山代表军队方面也是副组长。以后郑维山回忆说，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华北组的成员一个接一个表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旗帜鲜明呢？谁敢不旗帜鲜明呢？

按照惯例，分组开会后各组都要搞出简报。8月24日讨论后，晚上11点多，在华北组

负责简报的黄道霞把他参与整理好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拿来送审。这份后来被编为全会第六号的简报，内容主要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实录。简报送到中央办公厅，很快就印发了，这就是九届二中全会的“第六号简报”，也就是后来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简报”的出笼经过。

简报中写道：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还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中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参加华北组讨论的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说，不管是在小组会上还是简报上，都没有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